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孙中山与陆佑关系考*

A Study of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un Yat Sen and Loke Yew

吴玮岷/张晓威

(GOH Wee Meng / CHONG Siou Wei)

摘要

孙中山把具有雄厚财力的海外华侨视为援助革命经费的最佳对象, 希望藉此解决革命党人在筹募军需以资助反清运动、庇护南来革命同志及接济领袖家眷、巩固与纾困革命宣传机关上所面对财源不足的问题。南洋华侨陆佑即是这个富有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他是集店东、矿业主、头家、侨社领袖等于一身的商业大亨, 遂成为孙中山极力拉拢的对象。本文将通过对史料的整合, 尝试处理前人未及论述之处, 翱此一窥孙中山与陆佑的关系, 以及陆佑对辛亥革命的反应与考量。

关键词: 孙中山、陆佑、辛亥革命、海外华侨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were a part of Sun Yat Sen'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y were the main financial supporter to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China. Besides from

* 本文曾于2016年6月11日假拉曼大学双溪龙校区所主办的“孙中山与南洋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 原题名为〈孙中山与陆佑〉。承蒙审查委员之建议, 特改为〈孙中山与陆佑关系考〉。此外, 对于两位匿名审查委员所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 在此亦表达诚挚的谢意。然文中若有任何疏漏与未臻之处, 概由笔者自负, 尚祈诸位先进、方家不吝指正。

吴玮岷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硕士生。E-mail: bp_laoxu@yahoo.com

张晓威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长。E-mail: chongsw@utar.edu.my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20

supplying arms and manpower, the overseas Chinese including some of the wealthy merchants also offered refuge for revolutionaries who escaped from the abortive uprisings. At the same period, Loke Yew, a Malayan Chinese, is one of the wealthiest entrepreneurs at the time and also a philanthropist who gave back to the city where he made his fortune. He was one of the tycoons approached by Sun Yat Sen for seeking funding and aids. Although a voluminous studies of Loke Yew have been made recently,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about his attitudes and consideration towards 1911 Revolution. This essay aims at providing an overview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Sun Yat Sen and Loke Yew, and analyze the attitude and consideration of Loke Yew towards Sun Yat Sen'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Keywords: Sun Yat Sen, Loke Yew, 1911 Revolution, Overseas Chinese

一、前言

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最早是在海外华侨散布的地区根植与发展，甚至后来的革命运动之人力与财力资源，亦主要筹集于海外华侨地区。孙亦曾说过：

同盟会之成，多赖海外华侨之力，军饷胥出焉。及满清既覆，人人皆以为有不世之功，而华侨类不自伐，唯吾深知同盟会中非有华侨一部分者，清室无由而覆，民国无由而建也。

（秦孝仪等1989a：587）

上述谈话反映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1907年清政府施压日本政府，迫使其驱逐孙中山离境，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中心因而由东京逐渐迁往南洋。（苏庆华2015：22-23）此次南迁是南洋华侨登上革命舞台中心之滥觞，亦改变华侨对革命的看法与态度，将原先大致是支持清政府或维新派的力量扭转过来，使之日渐倾向革命，为援助日后屡次的革命运动，打下有力基础。

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迫于财政、人口与外在压力，逐步开放海禁政策。与此同时，西方各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它们迫切地需要从南洋殖民地取得更多的原料资源与经济作物等，提供给国内的工业链以进行生产。

运河、铁道路、种植、矿产等的开辟与开拓，皆需大量劳动力，中国大量贫困的人口自然而然地成为目标。各殖民政府和当地土著政权都不同程度地采用招诱华人的政策。（庄国土2001：138）故此，在内的推力与在外的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大量中国移民涌入南洋。

由于南洋各地华侨的数量，远较其他海外地区为多，极易成为革命党人寻求支援的目标，且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国，易于藏匿、联络、策划与发动革命，故得到青睐。此外，南洋一带华侨的财力亦是革命党人选址的考量之一。清政府早于革命党人意识到南洋华侨，特别是商人阶层的财力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遂有了鬻官卖爵予南洋华侨的制度，以筹集救济金、防务经费、海军军费、国家基金等，填补财政缺口。（颜清湟1972：58-59）再者，当时大量侨汇由中介人和中介组织——水客和侨批局，协助中低阶层平民把款项从南洋寄回中国，在在显示了南洋华侨在革命财援上的潜力。（戴一峰2009：21-22）一直苦寻革命经费的孙中山，不可能无视此事实，放弃这个后来一次又一次支援其革命的大后方。

初始，孙中山把南洋上层社会阶级，如富有的店东、矿业主、种植园丘的头家等人物视为援助革命经费的最佳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雄厚财力，能即刻有效地解决革命党人发动军事所面对财源不足的问题。其中，陆佑即是这个富有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是集店东、矿业主、头家、侨社领袖等一身的商业大亨，故成为孙中山极力拉拢的对象。是故，本文将透过对史料的整合，尝试处理前人未及论述之处，藉此一窥孙中山与陆佑的关系，以及陆佑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反应与考量。

二、新马富商对革命运动的反应与态度

1900年7月9日，孙中山首次抵达新加坡，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营救被康有为“诬陷”下狱的宫崎寅藏和清藤幸七郎二人。¹（刘世昌1986：50）此次事件后，相信孙中山对新加坡已有初步认识，遂有在当地推动革命事业的构想。1901年孙安排尤列前往新加坡活动，此举不仅陆续吸引当地青年华侨加入革命行列，甚至更奠定日后革命派在当地设立同盟会分会的基

础。（欧阳昌大1972：95-96；刘世昌1986：53）是故，当孙中山在1906年4月6日抵达新加坡后，在陈楚楠、张永福等人的迎接下，即前往已准备妥当的晚晴园，并在该处成立同盟会分会，日后更成为在南洋英属和荷属等地的革命总机关。²（罗家伦主编1994：289；欧阳昌大1972：92）

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创会领导人与原始会员，绝大多数是比较富有或稍有身家的商人，如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等皆是出身经济较为宽裕的商人家庭。（颜清湟2008：110）至于社会底下阶层如苦力、店员、小贩等皆未被邀入会，显示孙中山初始是着重于争取富有商人参加革命的态度。这主要是为了应付孙中山发动革命的需要，因为自二十世纪初至二次大战前，新加坡、马来亚的华人社会一向由富有商人所控制。（颜清湟1982：111-112）富商在华侨社会享有较高的地位与声望，与殖民政府或土著王侯的关系密切，如能拉拢他们加入革命阵营，不仅仅能为革命运动提供丰厚的财力支援，更成为革命党人抵御清政府或维新派攻击的挡箭牌。

其实，早在新加坡同盟会分会尚未成立前，孙中山已有要为将来在中国南部发动的革命军事运动，筹集两百万元充当军费的构想，而目标即是南洋各埠的富商。1905年9月30日，在一封孙中山寄给陈楚楠的信函中提到：

在吾党中之留学生，有比宁、哇华等地之富家子弟者，今有数人不日拟回南洋，商之其父兄，请出大资财以助革命者，此事亦甚有望，如此则革命之举，不日可再起矣。弟于西十月七号由此发程去西贡，与彼中大商商办举行债券筹款一事，拟筹足二百万，以为革命之资，由南洋各埠富商认借，每券千元，实收二百五十员，大事成功，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起，限五年内还清。西贡、哇华、比宁，已有富商之子弟认股，将来又说其父兄，倘能答应，则二百万之款，不日可以筹足，未知贵埠有无富商认借，此亦觅大利之一道也，望足下图之。欲知详细，请来西贡面商可也。

（秦孝仪等编1989b：40）

当时，对于取得富商支持，孙中山可是怀着较为乐观之心态，故对富商提出前来西贡面商的邀请。故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后，孙中山即积极筹备在英属马来亚设立分会。不久，他便踏上马来半岛，向各地宣扬革命理念。其路线是沿着西海岸一路由南到北，经芙蓉（Seremban）、吉隆坡（Kuala Lumpur）、怡保（Ipoh）后折返新加坡。（颜清湟1982：114-120）此趟之行除了要在当地的侨社建立起革命组织外，亦是孙中山将其争取富商支持革命的构想付诸行动的一步。是故，这一趟马来亚之行皆是以富商集中居住的锡矿区为主，是寄希望于马来亚富商，盼他们能在财力上支援革命党人的军事运动。

然而，此趟之行孙中山所得到的反应却是不一的。撇开社会底层人士不谈，孙寄以厚望的社会富有阶级，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回响。据颜清湟的研究，富有华商不愿支助革命的原因有三。第一，富人为了财富安全考量，不愿与现行政治权威体制相抗衡；第二、有些富人已在新马一带居留多年，依靠英殖民政府保护而赚取巨额财富，经济利益与英殖民统治息息相关，对中国政局无念无感；第三，富人倾向于与现行的中国政治权威相联系，透过清政府鬻官卖爵的政策在侨社建立威望，亦维持在中国国内的经济投资利益。（颜清湟1982：293-295）

因此，除了在芙蓉、吉隆坡获得一些商人同情与支持外，³ 孙中山在争取富甲一方的大亨方面，是一无所获的，甚至受到安全威胁。例如孙抵达怡保后，当地革命分子即招待他们住宿在华侨社区对大众开放的霹雳新改良商局内，这一举动引起当地锡矿业钜子兼维新派领袖——胡子春⁴ 的大大不满，甚至公开威胁要以武力对付孙等一行人，迫使他们转而迁入另一间旅社，翌日即由怡保折返吉隆坡。（张永福1933：15-16）

不过，孙中山在停留吉隆坡之时，却是成功与另一名矿业钜子——陆佑会上一面。据陈其瑗⁵ 整理彭泽民⁶ 的遗稿所示，孙中山与陆佑会面后，对革命同志说：“我对陆某并没有什么要求，只想问他爱祖国不爱祖国；既然他不爱祖国，也就不须和他谈什么了。”（陈其瑗1981：396）此稿件后由大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编入《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初版于1961年，其具有意识形态的遣词用字，在此不做多谈。不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得知此次会面孙中山并没有说服陆佑，让他捐助军费予革命党人，或加入革命阵营。但是，孙与陆会面之后，彼此之间的关系，亦不如上述记载那般僵硬或是撕破脸皮。毕竟，以现有的史料观之，在在地证明此次游说失败，并没有打击往后孙中山拉拢陆佑的决心。

三、孙中山寻求陆佑支持革命之始末

陆如佑，又名陆佑，⁷字弼臣，号衍良，原籍广东鹤山。本姓黄，七岁时因父母俱故，卖身于新会县桐井乡地主——陆显（又名明显）。11岁以契约劳工（卖猪仔）身份南来新加坡，在柔佛丰盛港（Mersing）采矿3年，后进入粤人罗奇生烟酒庄工作3年，17岁恢复自由身，后自创“兴隆号”杂货店。（李业霖2003：126-127, 133；李永球2003：27）经营杂货店四年后，陆佑储蓄了99元，接着赴太平矿场工作。（Robson 2001：31）初时，他在四邑同乡的矿场当厨师兼采购，随后经营农粮蔬果等生意，供应当地居民所需，生意颇为兴隆。（吉隆坡广东义山特刊编辑委员会1978：14）陆筹足资金后，在甘文丁（Kamunting）与友人经营矿场。唯1873年的拉律战争使其经营的事业毁于战火之中。

须知，1873年2月，拉律战争开始，华人社会中主要对抗的有两大阵营，分别以义兴和海山为首。⁸从2月至10月，双方互有输赢，战事呈现胶着的状态，而邱天德领导的槟城建德堂却在这关键的拉锯时刻，全面投向海山公司，联成一线。⁹（陈剑虹2015：147）显而易见地，建德堂会倒向海山阵营，不外乎建德堂在槟城与义兴公司处于竞争关系，且素有恩怨，两个华人帮会更是1867年槟城大暴动¹⁰的敌对主角。战后，霹雳的海山阵营与义兴阵营虽然各自在英国人划定的区域活动，但为了经济利益，台底下的明争暗斗还是没有平息。

不过，英国参政司休罗（Hugh Low）却特别钟情海山和建德堂两大会党领袖的投资潜力，运用他们的资本，开发霹雳内地。（陈剑虹2015：152）再者，休罗和邱天德的私人关系特别融洽，在这位殖民地官员的影响下，义兴公司在1877-1879年苦心经营的槟城饷码，轻易落入建德堂邱

天德手中。邱除了牢控槟城的饷码外，也和海山会党的领袖郑景贵¹¹ 联手垄断霹雳的大小烟酒、赌档、栳叶和亚答叶买卖饷码，建立建德堂和海山公司在第三次拉律战争后的联合王国。（陈剑虹2015：153）

虽然义兴阵营主要是以新宁为首的四邑人和潮州人居多，但是陆佑却选择与五邑人居少数的海山阵营合作。可见除了自身的努力与才干外，在各方势力角逐竞争下，因为陆参透出其中的捭阖纵横，战后遂能克服屡次挑战，进而发迹。在此脉络下，就不难理解陆佑在拉律战争后，其经营的事业已付诸东流，为何能藉着提供英军军需用品撑过苦日子。随后，在甘文丁与邱天德合作开矿，亦因锡价大跌而损失惨重，却又能获得承办甘文丁地区的饷码，再度由黑翻红，人生几起几落，转折不可谓不大。再者，陆佑与邱天德、郑景贵关系之密切，尚可从他们结为姻亲一窥视之。陆佑与第四位太太林清金所生下的次女陆宛平，其夫婿即是邱天德之孙——邱德意，而邱德意本身亦是建德堂领袖，从事饷码承包工作。（内田直作1970：109-111）而陆佑次子陆运怀之妻——林翠兰，¹² 即是郑景贵的外孙女。（林博爱等1924：19）

1875年11月2日，驻霹雳参政司毕治（J.W.W. Birch）被刺杀，¹³ 英国派军前来缉凶，陆佑成为英国驻军粮食和日用品的供应商。1876年，他与槟城的邱天德合伙於甘文丁创办一个新矿场。初始尚有利可图，不过1878年因锡价崩跌，损失惨重，幸得霹雳参政司休罗批准，承办甘文丁地区的饷码。¹⁴（李业霖2003：136）后又因霹雳近打河谷（Kinta Valley）发现丰富锡苗，陆佑投资得当，是其中一名获利者。（Wright 1908: 895）

1882年陆佑返乡，1886年左右再回返马来亚。有了先前的经验后，陆佑透过与英殖民官员、侨社领袖良好的关系，在1890年至1907年间取得四州府¹⁵ 各地区饷码的营售权，获得庞大利润。其事业遍布新马各地，且投资范围广，包括矿业（如锡与金的开采）、种植业（如橡胶、椰子、咖啡等）、运输业（如船务与汽车贸易）与金融业（银行）等各个领域，是富甲一方的大亨。陆佑在商业上成功后，对于各团体、学校等之创办多有捐助。¹⁶

鉴于陆佑在英属马来半岛拥有惊人之财力与良好的人际网络，急需革

命财源与庇护的孙中山将目标对准陆佑，寻求他对革命运动的支持并不出奇。以彭泽民遗稿观之，1906年8月孙中山的吉隆坡之行，除了在当地成立吉隆坡同盟会分会，亦是他与陆佑接洽初始。时隔约莫两年，在1908年3月7日一封题名为“镇南关之役致邓泽如函”中，信中除了提及镇南关之役的战况外，孙中山再度提及陆佑，希望邓泽如能游说陆佑捐出军费10万至20万元，以作为约降清军之用途：

陆弼臣翁前曾与弟晤谈数次，与语革命之事，弼臣翁极为赞成，惟以须先立根据，乃可从事，故劝弟宜先营矿务等等，厚集资财而后用之。今者革命军转战如是之久，兵力如是之劲，可云根据已立矣，而又有千载一时之机会，如此烦兄晤陆弼臣翁时，可善为说辞，以观其意，倘弼臣翁有赞成之心，祈即电知，弟可来会。

（秦孝仪等编1989b：60）

函件内容透露出几点重要讯息，一是孙中山与陆佑之会面，在此前并不仅仅只有一次，且两人的关系并不如彭泽民遗稿记载那般僵硬与破裂，不然何来二人接下来数次的会面。二是陆佑并没有直接拒绝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仅要求他实事求是、经营矿业以累计革命资本，以至于孙要邓泽如在游说陆佑时，善为说辞、以观其意。

一个多月后，即1908年4月30日，孙中山再度致函邓泽如，盼他在游说陆佑一事上能施以更大的力道。出于此前在新马呆过一阵子，孙中山对新马侨社有了一定的了解，故不同于1905年所怀有的乐观心态，此次孙中山主动希望能亲身前往与陆佑再度见面，并派遣汪精卫到芙蓉与邓详谈此事，甚至还承诺许以大利于陆佑，以换得他财力上支援革命：

弼臣翁处，弟意欲专托吾兄为我善为说辞，今有致弼臣翁书一封，祈兄拨冗专为此事一行，以热诚感之，以大利许之，或能有效也。最好在说弼臣翁函邀弟来访，更易说话。来书论许以利权各节，诚为有见，弟书先问其欲得何等之利权，俟其回答如何，再为商量。此事总望费神，非异人所能任也。弟不日复遣精卫君

来芙蓉，与兄相会，面筹一切。

(秦孝仪等编1989b: 63)

同年5月，孙中山陆续地寄给邓泽如两封信。题名为“致邓泽如请偕黄心持力图说动郑弼臣助饷函”，函中有云：

日来我云南军所至皆捷，清兵之归降者，已盈四千有余，每日粮食、军火甚巨，必当源源接济，至破云南省城之后，乃能自给。现正待济甚急之时，弟前日连有函电询及弼翁肯否助力，未审如何？此翁一诺，则大事成矣。方今吾军正在声威大振之时，望足下与心持兄竭力动之，如能成就，则足下等之造于革命军功德实无量也。前所谋加补钦廉军火及招纳广西营勇两事，皆以云南之急，未有余款兼顾，实大滞动机，如款项足以招呼三处，同时大活动，则清虏之灭，易如反掌矣。

(秦孝仪等编1989b: 64)

未几，另一封“致邓泽如黄心持再请说动郑弼臣¹⁷助饷函”则云：

兹得河内总机关处来函，更知非急得十万之款，则不能进取裕如。今将原函抄来一阅，便知其详矣。惟此十万大款，将从何得，其能为力者，舍弼翁实无其人。日来函电相托游说之，俱未获复示，想事未易入手也。惟持之以坚忍，出之以至诚而恳求之，则终未有不动心者。若屡求而屡却，而求者之望仍不失，则终必有应之时也。但前者兄等之竭力以助革命军，实出于热血，出于大义耳。若问革命前途有何把握，则兄等自问，亦茫然也。今有河内来函，读之必了如观火，从此兄等之出而说人，必更有把握矣。既有此详细事实，以为运动之资料，弟是以有更望兄等接此信时，再三向弼翁游说，必得承诺而后已也，盖此事所关非小，吾党今日成败得失，则在于此，此实为数千年祖国、四万万同胞一线生机之所系也。故必欲兄等再三四而图之，必抵于成而后已也。惟运动之方面，必随时而变，先当动之以大义：不成矣，必再动之以大利；想此两方法，兄等必已试之而无验。然更有一法，则当动之以情谊。兄等与弼翁相往来有年，交谊自然

而深，用此为游说之具，或比二者为尤有力也。惟用此法，必得多人合力，方易成事，于此弟想陆秋杰君必可合力。惟此又必要先得陆君之深信此事之有把握，彼乃肯合力以说他人，及自出力以助革命军。弟素闻陆君老诚持重，不轻然诺；若一得彼之诺，彼必言出惟行。今于革命之事，吾知陆君非无其心，惟不详知革命事业之内容。闻日来吾党所传布云南革命军之事，彼亦不大深信，盖以西报不多论其事也。。。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望如法先说肯秋杰君，然后同彼协力以说弼翁，事当有成也。

（秦孝仪等编1989b：65）

镇南关之役与钦廉之役两次革命军事运动中需款之急，可以由上述信函内容观之。从函件短时间内来往之密集、且动员多名同盟会重要领袖，¹⁸ 要求对陆再三游说、最终甚至是承诺许以云南全省开矿权十年作为条件，可见孙中山对陆佑的财援是寄望之深、期盼之切，惟最终没能成事。

钦廉之役¹⁹后，即1908年6月9日，有一封孙中山致给邓泽如的函件，题名为“致邓泽如等告以人多饷少云南军事无法进展函”云：

云南军事，以人多饷少，不能进步。前月二十四日大胜一仗之后，则行收队，不守铁路河口等处，此弟前日函电已详言成败之机，系乎接济，所以有托兄等力说弼翁之举也，今事已如此，不禁为之痛惜。夫以十万元便能取得云南全省，吾人之力犹不能办，此尚复何言。

（秦孝仪等编1989b：66）

孙将起事失败之因，归咎于未能筹得十万元，自叹力有不及，亦有隐隐指向此前他寄以厚望的陆佑。未知是希望愈高而失望愈大，接下来几次革命起事运动、²⁰接济逃难革命党人、亦或是革命党报《中兴日报》面对严重的财务困难，现有史料皆不见孙中山求助于陆佑。（秦孝仪等编1989b：76-126）

辛亥革命后，各省革命党人在筹组临时军政府之际，皆面对经费短缺

的问题，尤以中央政府为甚，因此向华侨求借军饷、推销债卷等成了补足财政缺口的一大来源。1911年11月30日，孙中山致书邓泽如等云：

邓泽如、陆弼臣、谭扬兄回鉴：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任阁下等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国债票日间付上。孙文叩。

（秦孝仪等编1989b：172-173）

1912年1月3日，邓泽如复函孙中山云：

携总理来电，往吉隆坡访陆佑，允担任十万。即日由渣打银电汇五万返广东，交财政司李煜堂收，汇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二两，交上海徐桂亭收。

（邓泽如1948：83）

有别于早些年的苦苦哀求，亦或是长篇大论的函件，此次孙中山之信函仅是三言两语，而陆佑透过邓泽如知悉孙需款甚钜后，当天就汇了十万元予临时政府。如此慷慨解囊，态度之转变，深切地影响了后世史家对他的看法。

四、陆佑对革命运动的态度及考量

依目前相关著述、研究成果观之，论者多指责陆佑虽富却不肯财援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亦或是将陆佑先前拒绝援助孙中山一事，辛亥革命后其态度却大为转变，巨款财援革命党人一事，摆在一起论述，如：

南洋巨商陆佑，拥有遗产四、五千万，与中山先生亦曾相识，革命党人邓泽如对其帮助亦多，邓因请其助款不应，而拒与往还。

（蒋永敬1982：265）

民国元年一月三日邓泽如获中山先生电后，往访富商陆佑，请其捐助革命，陆佑立刻允捐十万大款，并即日电汇广东五万，电汇上海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二两。这与民前四年（一九零八）邓氏苦

口婆心，用尽心力游说而不为所动的情况相较，辛亥革命各省光复后，华侨富商态度的转变，十分明显。

（吕芳上1986：357）

亦或是带有贬义色彩地批评陆佑，将钦廉之役败因归咎陆佑，如：

可见中山先生对陆寄望之深、期盼之切，无奈任邓等如何说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陆某卒不为所动而一毛不拔，至少在民国元年以前，没有听说陆氏曾支持过同盟会。由于陆氏“一个钱也不肯捐”，河口得而复失，乃告失败。

（孙子和1997：416-417）

当然，亦有学者认为陆佑是曾热心赞助反清革命的，凭据在于其一，陆佑墓碑上刻有获“大中华民国二等嘉禾章”字样，以及陆之神主牌上有民国赏佩二等嘉禾章；其二，陆佑“兴隆庄”的职员周之桢、邓泽如皆是同盟会活跃分子，从事实际革命工作；其三，孙中山曾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授给陆佑旌义状，以表彰他赞助革命贡献。（李业霖2003：151）

前者之论不脱一般传统思路，即富商不愿支助革命，真正愿意参与与帮助革命的，则是侨社内之中、下层阶级分子，遂采用二分法将陆佑归为前一类。而后者之言则有过度褒奖之嫌，毕竟陆佑获得勋章、旌义状之因，与其在屡次革命时之作为无关，不然即与现有史料呈现之内容不符，应当是为了表彰其辛亥革命后做出表率，巨款财援临时政府。关于陆佑对革命运动的反应，应跳脱二分法的框架，吾人认为陆佑是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愿意公开参与，也不愿意表态反对，如此模棱两可的态度，是陆佑个人性格使然，亦是其在商场打滚多年所炼就的特质。故此，遂有孙中山屡次前来游说之局面。

陆佑这种性格，可称之为商人性格。商人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利益，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是商人参与政治的根本动力与出发点。（马敏2011：185）对于一个商人而言，一种理想的投资方式，即是将鸡蛋摆在不同的篮子，透过不同的投资组合，商人的投资风险将会分散，整体亏损

几率亦大大降低。倘若其中一个投资选择表现不尽理想，则投资整体表现所受到的影响也不会太大。是故，若以上述商人的投资心理理解，就不难解释为何孙中山多次寻求陆佑财援革命运动，陆佑不正面拒绝，也不出言反对，反而要刷起太极，要孙经营矿业以累计革命资本。孙中山为寻求援助而多方奔走，见多识广、善察言观色，才会在信中言：

弟素闻陆君老诚持重，不轻然诺；若一得彼之诺，彼必言出惟行。今于革命之事，吾知陆君非无其心，惟不详知革命事业之内容。

（秦孝仪等编1989b：65）

其次，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利益还表现在商人对政治是非的界限模糊，功利主义浓厚，以商场原则代替政治原则，以经济利益标准，取代政治判断标准。（马敏2011：186）陆佑模棱两可的态度，实际反应在他的商业伙伴及部属身上。在其经营的“兴隆庄”中，职员周之桢与邓泽如皆是同盟会活跃分子，且从事实际革命工作。此外，吉隆坡同盟会第一任会长陆秋泰及其弟陆秋杰在生意、个人交情上与陆佑多有往来合作。（Ar & Ch’ng 2020: 54-55, 67, 98）其中一名被孙中山点名，可以合力劝说陆佑在镇南关之役与钦廉之役捐出十万大款的即是陆秋杰。陆秋杰曾是陆佑铁道公司的交通部经理，以及陆佑在森美兰与彭亨饷码公司的代理人（Wright 1908: 160）尤有甚者，陆佑与陆秋杰在同一华社团体，即雪兰莪中华商会，分别担任主席与副主席一职。当然，若以上文所述作为推断陆佑直接参与或认同而支持革命活动是过于武断，且具误导性的。不过，陆佑并没有排斥与革命派人士在商业、私人情谊上的合作与往来，或是向清政府通风报讯、杯葛或阻拦革命活动，对革命党人来说，无疑就是一种大大的鼓舞。

当中，又以邓泽如²¹涉入最深，留下的史料最多。除侨居新马之际，孙中山对陆佑之游说工作一般上皆交赋予邓泽如完成，历次的书信往来即是最好的佐证。在邓泽如领导下，瓜拉庇腾同盟会在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之役、河口之役及广州三二九之役均有捐献。广州三二九之役

前，依书信、档案记录，透过当地汇出的款项至少有7750元，这尚不包括资助孙中山赴欧以及汪精卫赴仰光的旅费4400元。（邓泽如1948：22；秦孝仪等编1989b：82）对于同盟会在新马一带的宣传媒体《中兴报》，当地华人尚购买数千元股份。（秦孝仪等编1989b：89）此外，当地华人还两次庇护南逃革命军人。（邓泽如1948：34，80）不仅如此，在同盟会祸起萧牆之际，瓜拉庇勝华人两次在《中兴报》驳斥反孙运动的种种指控，是新马地区少数挺身而出，捍卫孙中山的支持者。（《中兴日报》1909年11月22日：2；《中兴日报》1909年12月8日：2）广州三二九之役，以瓜拉庇勝为首的地区筹集将近两万元，执新马各埠之牛耳。三二九之役筹募过程中，孙中山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后，邓氏统筹各埠，三度奔走筹募。（邓泽如1948：37-43）随后，黄兴、胡汉民相继离开新马赴港，邓氏亦负起向各埠催收捐款之责。邓氏在整个广州三二九之役募款过程中，起著不可忽视之角色。

细细爬梳，可发现邓泽如与陆佑出身背景极为相似，皆为广东新会人，虽然陆在十一岁之前祖籍广东鹤山，但两人是同乡亦或同属四邑²²之背景，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此外，新会县曾在隋、唐时期为冈州，明、清以来才陆续分置开平、鹤山、台山等县，地域情感与方言群认同上，恐有别于其他地区。况且，无论是新会亦或是鹤山，甚至是陆秋杰、陆秋泰之故乡顺德（即今佛山市）皆与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即今中山市）毗邻。陆佑、陆秋节、陆秋泰、邓泽如与孙中山的广府同乡情谊，即有着地域上的“差序格局”²³观。除此之外，对于自己的得力助手是革命党要员，为革命运动筹款奔走于马来半岛各埠一事，陆佑不可能全然不知。有趣的是，陆佑既没有向维新派或清政府举报，或是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其部属的相关活动，着实令人玩味。

再者，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续政权，相继进行多次政治改革，唯成效不彰无法扭转劣势。中国本土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如1908年7月清政府镇压附属于维新派的政闻社、9月颁布拟议中的宪政体制大纲，皆让新马一带的维新派措手不及，无法对革命党人的攻击进行辩护。（颜清湟2008：113）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后，粉碎了维新派期待光绪

重新执掌政权的希望，其支持者纷纷转向革命阵营。两派之间长达数年的竞争，至此胜利的天平逐渐倾向革命派。（颜清湟2008：114）有过丰富社会历练的陆佑，不可能不敏锐地洞悉出当中的利害关系。不过，基于商人在政治上总是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政治活动限定在官方许可范围内，尽可能不与官方起冲突，所以其政治行为一般都较为稳健保守，不愿意走极端路线，以免惹祸上身。²⁴（马敏2011：197）一般上，在新马一带支持革命派的商人，²⁵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大都与清政府没有太多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关系。（颜清湟1982：297-306）

有别于一般商人，属于大亨级别、拥有庞大商业王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陆佑，既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为后晚清时局做准备，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不失为最好的选择。故此，陆佑自己虽孑然一身，却对麾下部属的革命行为，采取一种视而不见、放任的态度，为日后留下一条后路。由此观之，没有陆佑的默许，部属邓泽如是不可能一边厢为其工作，另一边厢却为革命运动劳心劳力的，特别是当时的海外华人企业，充满着儒家的等级与家长主义观念。²⁶（颜清湟2005：28）

综上所述，陆佑会捐出巨款财援民国临时政府就不难理解了。1912年2月9日，邓泽如护送孙中山夫人、女儿、侄女、佣人一行由槟城搭英国游船返回上海。后赴南京觐见孙中山，推辞广东都督一职，游历南京、杭州后返回广州，往恩平、翁源、曲江等地调查矿务，以便号召南洋华侨投资故乡，而与邓同行并商量投资事宜的正是陆佑。（邓泽如1948：84）

五、结语

就反清革命运动而言，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迫切地需要财源的支助，以发起源源不断的军事革命运动。是故，拥有雄厚财力的南洋富裕华侨为孙中山所重视，以向他们募款资助革命经费。然而，这些富裕的上层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与反应是有多方顾忌与考量的，如他们自身、家人亲戚、财富的安全、与清政府或殖民政府的政经利益关系、思想上的桎梏等等。

孙中山初期并不了解这样的态势，处处碰壁，以至毫无所获。之后，

孙中山的人脉随着新马各埠建立起同盟会分会而活络起来。透过这些人际网络，他欲实现寻求大亨级别富商支援革命之构想。可惜时至辛亥革命爆发，始终没有达成。在这样的脉络下，孙中山希望邓泽如、陆秋杰等革命派人士游说陆佑财援革命运动则不难理解。面对一系列的游说以及革命运动而言，陆佑始终保持影影绰绰、似有若无的暧昧态度。然而，坚定地支持革命运动却在其部属邓泽如、商业合作伙伴陆秋杰等人身上体现得一览无遗。这种复杂的人情世故关系网得以维系，相信与当事者皆具广府同乡之背景不无关系，也是陆佑希望透过邓泽如、陆秋杰等与孙中山的关系，在晚清政权摇摇欲坠之际，为自己多保留一种选择的体现。

最后，若要将新马一带之富商以简单的二分法划分，归类为维新派、清政府的支持者，亦或是革命派的支持者，是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这是因为抱持着与陆佑相似，有着商人性格且对革命持有模棱两可、似有若无态度的富商，虽不可考，但应大有人在，有待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注释

- 1 不过，按张克宏的研究，无论有否发生该次的“刺康案”，孙中山其实早已计划了此趟新加坡之行。换言之，孙中山并非为了要救宫崎而来，是当他抵步之后才知道宫崎等人被捕的消息。（张克宏2006：103-136）
- 2 1907年，随着同盟会内反孙中山主要人物陶成章等周游南洋各埠，成立有别于同盟会的组织，在华侨社会内发表反孙之言论，且煽动南洋革命党中反孙之情绪，甚至透过公开信函攻击孙中山。位于新加坡的南洋革命总机关受到这股反孙势力之影响，几乎陷入停顿的状态。是故，该机关于1910年从新加坡迁移至槟城。
(张少宽2004：47-50)
- 3 如芙蓉的朱赤霓、黄心持、李梦生，吉隆坡的杜南、陆秋泰、陆秋杰等。（颜清湟1982：114-118）
- 4 又名胡国廉，福建永定客家人，为当时新马华人富有者之一，为英殖民政府任命为霹雳立法会议员，代表华人锡矿商之利益，1906年曾向清政府捐纳一万叻币，其在中国有巨大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获清政府授予多项官衔。不过在实施“铁路国有”政策后，开始与清政府交恶，并在辛亥革命后转向支持革命党。（颜清湟1982：119）
- 5 陈其瑗，祖籍广东广州，1888年生，1968年卒。192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书记，支持联俄容共政策，1949年后，曾任中共人大委员、

- 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娄熙元等编1991：1029）
- 6 彭泽民，字锦泉，号镛希，祖籍广东四会，1877年生，1956年卒。1902年来马，1906年加入同盟会任吉隆坡同盟会书记。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海外部部长、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支持联俄容共政策，1949年后，曾任中共人大常委、政协委员、常委等职。（娄熙元等编1991：1094-1095）
- 7 在马来西亚，一般上皆称其为陆佑，吉隆坡现存有陆佑大厦、陆佑组屋、陆佑村，此外吉隆坡、丹绒马林（Tanjung Malim）、叻思（Rasa）、关丹（Kuantan）、文冬（Bentong）及新加坡等皆有以陆佑命名之道路——陆佑路（Jalan Loke Yoke）、陆佑巷（Tepian Loke Yew）或陆佑街（Loke Yew Street）。（刘崇汉2018：172-181）据陆佑在吉隆坡文良港（Setapak）墓园之墓碑显示，其生于1846年10月9日，卒于1917年2月24日。（黄木锦2000：20）
- 8 义兴之盟友为和合社，海山之盟友为建德堂与和胜公司。（陈剑虹2015：148）
- 9 槟城华人秘密会党建德堂（俗称大伯公会）的领袖，由于商业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加之籍贯上分化，建德堂在其领导下，与槟城最大会党义兴公司屡有争斗。
- 10 槟城大暴动发生前，建德堂与义兴公司对于普吉岛矿场之争夺、槟城的鸦片烟酒饷码、客工买卖雇佣等各方面皆有实质上的冲突。1867年8月1日，建德堂指控义兴公司以及其穆斯林盟党白旗会成员从一位建德堂成员的空地上，偷窃晾晒的建德堂衣服。（陈剑虹2015：137-142）随后，双方阵营展开约10日的大械斗，使全槟城陷入停顿。此暴动使得海峡殖民地政府在同一年通过《维持和平秩序法令》，并在1869年通过《危险社团法令》，指定超过十人的社团皆需登记注册。（巴素1950：116-117）
- 11 郑景贵，名嗣文，字景贵，号慎之，1821年出生于广东省增城县绥福都良田的新村围（现今广州市增城福和镇联安郑新村），其父兴发，母赖氏，共育五子，景贵排行第三。（陈耀威2015：18）20岁左右奉母之意来马寻父兄，后于拉律采矿致富。第三次拉律战争，英国人介入调停期间，郑为海山会党的全权代表。三方签署邦咯协约后，郑成为霹雳华人甲必丹、州议会议员。随后因承包饷码，聚敛大量财富，成为太平首富。（李永球2003：1-5）
- 12 吉隆坡文良港陆佑墓园中，从陆家香亭往南走，现存一座翠兰纪念堂。（黄木锦2000：16）
- 13 毕治废除霹雳土酋的收税权与奴隶制度，重新调整鸦片、酒、赌博之税收，预先批准砍伐亚答和携带武器的申请等系列措施，引起马来土酋的不满。1875年11月2日，毕治在巴西沙叻（Pasir Salak）张贴税收通告时遭到刺杀。（廖文辉编著2017：188）
- 14 所谓“饷码”制度（Farm System），是指十八世纪末叶后，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各殖民地所推行的一种包税制度。简言之，即将民生主要消费之烟（即鸦片，又名洋土）、酒、赌、当等四大类，各别或联合数项，透过公开招标的方式招商承揽。得标者或承包商（亦称为“码官”）可取得二至三年的代理经营垄断权，

- 可向市场经销商收取相关税款。相对地，殖民地政府则饷码官收取固定的款额，并成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黄建淳1993：107-111）
- 15 指雪兰莪（Selangor）、霹雳（Perak）、彭亨（Pahang）、森美兰（Negeri Sembilan）。
- 16 陆佑是吉隆坡同善医院、尊孔学校、坤成女校的创办人之一，对于吉隆坡广东义山、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广肇会馆之创办，他都大力资助。（赵令雄等2006：14）除此之外，新加坡中央学校、莱佛士书院、陈笃生医院及香港大学等，皆多受其捐助。（刘崇汉2007：21-22）职务上，他亦担任过雪兰莪议会的议员、吉隆坡卫生局成员、雪兰莪矿务公会大总理等。
- 17 从时间点与信函内容分析，（笔者按）题名中的“郑弼臣”应为“陆弼臣”，即陆佑本人。至于郑弼臣，确有其人，名士良，号弼臣，广东惠阳人。郑士良在广州博济医学校学医时，与孙中山同校，因理念相同而订交。郑参与了1895年广州起事、1900年惠州之役以及兴中会的改组事宜。不过，郑随后于1901年在香港中毒身亡。（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20-24）
- 18 如汪精卫、邓泽如、黄心持、陆秋杰、谭扬等。
- 19 1907年广东钦廉地区（今属广西）民众要求蠲减糖捐，派代表向当局请愿而遭到拘捕。民众停耕罢市，进而演变成武装暴动。孙中山乘势联合当地民众发动起事，并攻克防城，最终因未能策反清军将领、饷械不济，而被迫退避十万大山以及越南。1908年，黄兴根据孙中山指示，再度在钦、廉、上思一带发动起事，与清军周旋四十余日后，因没有根据地依托，弹尽粮绝，再度退避越南与十万大山。（章开沅等编2011：310）
- 20 指1908年河口之役、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
- 21 邓泽如，讳文恩，亦作泽眷，字远秋，号愚公，广东新会皇边人，生于1869年4月23日，是邓方进之长子，世业农家。（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1935：1；孙子和1997：411；谭惠泉1965：811）邓11岁即随世父传媒习贾于阳春，居阳春七年。在南洋霹雳采矿之从伯传和返乡，携带邓泽如下南洋。抵新加坡后，于悦生店司出纳，为陆佑所识，旋转赴金宝（Kampar），从事矿业。接着定居庇勝，采矿、种植橡胶，兼经营杂货、药材生意。（陈嵩杰2003：115-121）1907年成为瓜拉庇勝同盟会会长，最终于1920年左右离开马来亚，回返中国。
- 22 指台山、开平、新会与恩平四县。另有五邑、六邑之说。五邑是在四邑的基础上，多出一个鹤山县。鹤山是由新会、开平两县改隶，五县在九十年代初皆已撤县设市。六邑则比五邑多出个赤溪，1867年发生土客冲突后，客籍人士聚居地潮居都大部分与矬峒都小部分从新宁县（台山县旧称）划出，1912年立为赤溪县，1953年被撤，复归台山县。（梅伟强与张国雄主编2001：3-4）
- 23 “差序格局”指的是中国社会结构以人伦为基石，以自己为中心，推出与自己产生社会关系的人群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如石子投入水中一般，越推越

远，也越推越薄。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费孝通2005：32）

- 24 如1900年，邱菽园因在幕后策略谋划、财政援助维新派在汉口自立军起事，事后邱家乡海澄原籍之族人遭到清政府逮捕。在新加坡的邱只好公开与康有为等绝交，再捐献赈灾银2万两，事情才告一段落。（张克宏2006：159-168）
- 25 如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林义顺、陈楚楠、张永福、邓泽如等。（颜清湟1982：297-300）
- 26 海外华人商业思想中其余重要的观念包括：和睦、相互责任、改革与进步。（颜清湟2005：28）

参考文献

- 巴素1950。《马来亚华侨史》。槟城：光华日报。
- 陈剑虹2015。《走进义兴公司》。槟城：陈剑虹。
- 陈其瑗1981。〈辛亥前后彭泽民先生和吉隆坡华侨的革命活动〉。载中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392-397。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 陈嵩杰2003。《森美兰华人史话》。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 陈耀威2015。《甲必丹郑景贵的慎之家塾与海记栈》。槟城：槟城侨生博物馆。
- 戴一峰2009。〈环南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一个历史的考察〉。载李志贤编《东南亚与中国—连接、疏远、定位》，页21-22。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 邓泽如1948。《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上海：正中书局。
- 费孝通2005。《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
- 黄建淳1993。《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台北：中华民国海外华人研究学会。
- 黄木锦2000。〈陆佑家族墓园赏析〉。载陈亚才编《留根与遗恨：文化古迹与华人义山》，页14-22。吉隆坡：大将出版社。
- 吉隆坡广东义山特刊编辑委员会1978。《吉隆坡广东义山八十三周年纪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广东义山。
- 蒋永敬1982。〈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载张玉法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三辑 辛亥革命）》，页257-27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李业霖2003。〈陆佑——悠悠百世功，矻矻当年苦〉。载林水壕编《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人物-儒商篇：创业与护根》，页125-156。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李永球2003。《移国——太平华裔历史人物集》。槟城：南洋民间文化。
- 廖文辉编著2017。《马来西亚史》。双溪毛糯：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 林博爱1924。《南洋名人集传第二集（上册）》。槟城：槟城新报。

- 刘崇汉2007。〈尊孔创办人——陆佑〉。载吴志超等编《百年尊孔人与事》，页19-22。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
- 2018。《陆佑》。芙蓉：石秀兰基金会。
- 刘世昌1986。〈中山先生与南洋〉。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页47-72。中和：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 娄熙元等编1991。《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 罗家伦等编1994。《国父年谱（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吕芳上1986。〈邓泽如与辛亥革命（1906-1912）〉。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页340-359。中和：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
- 马敏2011。《商人精神的嬗变——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梅伟强与张国雄主编2001。《五邑华侨华人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内田直作1970。《东洋经济史研究（一）》。东京：千仓书房。
- 欧阳昌大1972。〈新加坡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反应〉。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91-118。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 秦孝仪等编1989a。《国父全集（第二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1989b。《国父全集（第四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
- 苏庆华2015。《中山先生与槟榔屿》。台北：独立作家。
- 孙子和1997。〈南洋华侨邓泽如对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的贡献〉。载张希哲、陈三井主编《华侨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411-429。台北：国史馆。
- 谭惠泉1965。〈邓泽如事略〉。载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革命先烈先进传》，页811-812。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主编。
- 颜清湟1972。〈清朝鬻官制度与星马华族领导人（1877-1912）〉。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页58-59。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
- 1982。《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2005。《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2008。《东南亚华人之研究》。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
- 章开沅等编2011。《辛亥革命辞典》。武汉：武汉出版社。
- 张克宏2006。《亡命天南的岁月：康有为在新马》。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张少宽2004。《孙中山与庇能会议》。槟城：南洋田野研究室。
- 张永福1933。《南洋与创立民国》。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 赵令雄等编2006。《尊孔国民型中学百年纪念特辑》。吉隆坡：尊孔国民型中学董事会出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1935。《追悼邓公泽如专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

《中兴日报》1909年11月22日。〈责言〉。

____ 1909年12月08日。〈復泗厘歪也再寄匿名谤书者〉。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5。〈郑士良传〉。载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辑《革命先烈先进传》，页20-24。台北：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主编。

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AR, Junn Ng & CH'NG Symn 2020. *The Legacy And Heritage of Loke Chow Kit*. Petaling Jaya: CGB Consultants Sdn Bhd.

ROBSON, J.H.M. 2001. *Records and Recollections: 1889-1934*.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WRIGHT, A. 1908.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British Malay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